

“希望你们海纳百川敢于担当”

——在国科大2019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来宾，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今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科院也迎来了建院7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我们迎来了中国科学院大学第二届本科生的毕业典礼。在此，我代表中国科学院向国科大表示祝贺！向圆满完成学业的同学们表示祝贺！向远道而来的家长朋友们表示诚挚的欢迎和热烈的祝贺！

四年来，同学们用艰辛的努力换来优异的成绩，为学弟学妹们树立了好榜样。在即将毕业的309名同学中，7人取得双学位，271人继续深造。在这些继续深造的同学中，69人选择出国留学，其中，16人分别到普林斯顿大学、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世界名校攻读博士学位，另有2人赴美国耶鲁大学和卡耐基梅隆大学做访问。202人选择在国科大攻读学位，其中，到北京大学5人、清华大学2人，其余195人继续在国科大读书。本届毕业生继续深造率超过87%，比第一届毕业生高出2个百分点。另外，本届本科生参与撰写的学术论文达60余篇，部分论文发表在《Nature》等国际顶级期刊上，学术成果突出。

同学们，2013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科院，并对我院提出“四个率先”的要求，其中之一就是要“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为此，中科院提出“率先行动”计划并深入实施，招收本科生也是我院贯彻落实总书记

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近年来，院党组对国科大提出了“率先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具体要求，国科大不辱使命，深入实施科教融合发展战略，探索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新模式，构建完整高等教育体系，取得了显著成绩。

中科院党组高度重视国科大本科生的招生和培养工作，充分发挥科教融合体制、机制优势，提供了全院最优质的科教资源。为保障本科生培养质量，院属各研究所投入了巨大的科技资源和智力资源。我们看到，包括院士在内的优秀科学家纷纷走上讲台或担任学业导师。有的研究员当起了助教，许多杰出科学家、研究所所长担任了班主任。比如李树深院士、高鸿钧院士和席南华院士等等；还有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担任了学业导师或毕业论文指导老师。他们用人生智慧、科学精神和育人情怀，为同学们的成长之路点亮了一盏明灯。借此机会，我代表中国科学院向为国科大本科生培养做出重要贡献的各个研究所、各位科学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实践充分证明：2014年，落实习总书记重要指示，在教育部支持下，中科院党组作出国科大招收本科生的决策是符合规律、完全正确的，提出少而精、高质量的本科培养目标符合实际、完全正确的！希望国科大及全院上下共同努力，继续坚守初心使命，深入实施科教融合战略，把本科生培养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与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统筹推进，为国

家造就更多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

作为国科大的名誉校长和校友，在同学们就要离开校园之际，我想多嘱咐几句。

希望你们锤炼品德，提升精神修养。“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在开学第一课，李岚清同志作了题为《知识分子与文化修养》的报告，就是要让同学们明白德行的重要性。四年后的今天，你们对德行应该会有更深的领悟。我希望同学们能从充满智慧的先贤古哲、从享誉世界的学术名家、从亲密交流的师生同学中，汲取精神营养，修养浩然正气，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正、更远。

希望你们海纳百川，拓宽胸襟气量。无眼界则目寸光，无胸怀难成大器。以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怀去拥抱世界、走向未来，尊重不同的声音，注重与他人合作。做人做事，多一点包容、少一点计较。你会发现，一个善意宽容的举动，往往能带来令人惊喜的蝴蝶效应；让人受益的同时，你自己也能从中获得宁静和升华。我希望，同学们善意、开放、大地地融入未知世界，享受生活和学习的多姿多彩。

希望你们敢于担当，胸怀爱国之情。“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习总书记就在这个礼堂说的这句话，现在听起来依然掷地有声。“创新为民、科技报国”是中科院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不懈追求。自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从中兴事件到美国对华为、曙光的封锁，我相

信同学们已经理解国家对“卡脖子”技术的迫切需求了，这也正是你们的奋斗方向，是为你们吹响的集结号。我希望，你们要将个人理想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密结合，敢于担当、勇挑重担，成为党和人民信赖的未来科技领军人才。

希望你们珍惜友谊，互相鼓舞拼搏。在去年，国科大校庆40周年之际，北京卫视《档案》栏目组制作了一期节目，叫做《又见科学的春天——国科大40年国家国情》。节目引起校内外极大关注。最让我感动的是，海外的几位老校友发来信息说，他们是流着泪看完的，因为这个节目让他们想起了当年一起吃食堂、一起彻夜讨论问题的一幅幅画面，想起了做科研项目时，忘我拼搏的青春岁月。友谊是精神的陈酿，拼搏是青春的颜色。我希望，在今后十年、二十年、四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里，你们能够珍惜师生友谊，互相鼓励、彼此帮助，写出满溢情义、拼搏奋斗的岁月华章！

同学们，虽然今天以后，你们可能要离开母校，但是请记住，母校依然和你们荣辱与共。今后，无论你们有怎样的境遇，记得多给我们发些信息，或者多发些朋友圈，我们都会为你们点赞。也请同学们记住，中科院和国科大永远是你们温暖的家，欢迎你们常回家看看！

谢谢大家！
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国科大名誉校长白春礼

高教观点

美国学者马丁·特罗在其《美国教育民主化》一文中，首次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指标，将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分为精英、大众和普及三个阶段，这也是目前已经被国际教育界普遍接受的论断。根据该标准，一个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属于精英化教育阶段，达到15%~50%属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超过50%则属于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

按照毛入学率指标的划分，2000年前我国高等教育处于精英教育阶段，在1999年大学大扩招3年之后的2002年我国的毛入学率就提升到15%，超过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门槛。201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8.1%，即将由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迈入普及化阶段。而从高考录取角度来看，2018年高考报名人数975万人，实际录取790.99万人，实际录取率高达81.13%，这个比例在2017年就超过80%，尽管考上好大学很难，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考上大学已经成为比较困难的事情，中国高等教育基本上实现了传统意义上的“宽进”。

而在高等教育的另一端，社会各界和用人单位普遍希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政府部门也呼吁高等教育要严把出口关，可以说，“将中国高校关口扎得更紧些”已经成为教育部门、高校和社会的共识。但大学的“严出”不能停留在共识上，不能仅仅是一些人的口号。

多年以来，中国孩子的学生生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阶段性现象，那就是以大学为分界点，为了考上一所好的大学，大学之前累得要死，因为没有“严出”的社会文化氛围，上了大学之后嗨得要死。甚至很多人从小受到的激励就是：现在又苦又累无所谓，考上大学就能玩了。

于是，作为学生生涯“间隔年”，离社会最近、最应该下苦功夫学好本领的大学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的却是大学生上课睡觉、通宵游戏、逃课恋爱、喝酒吹牛等“放飞自我”的颓废，临到考试再抱佛脚，或者求老师放水给及格分，一路绿灯，大学本科四年就浑浑噩噩地轻松毕业了。

不过，从去年开始，政府官员表态要扭转“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的现象，对大学生要合理增负，打造金课、淘汰水课，切实提高毕业论文（设计）质量，强化教师教学主体责任……上述的“好日子”眼看就要到头了。但光靠政府部门呼吁甚至发文件，如果不调动大学生主体的积极性，恐怕难以扭转大学目前的状态。

华中科技大学在2018年有18名学生因学分不达标，从本科转为专科，其中11人已在6月按专科毕业，为高校的“严出”做了新尝试。被不少学生视作救命稻草的“清考”制度，也即将退出历史舞台，引起了媒体、学生家长的一片叫好之声。但单靠个别或一些大学领导的觉悟，仍难以取得持久性的好转。

需要指出的是，“严出”是手段不是目的，不能为了“严出”而去设置什么淘汰率或者末位淘汰，这样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况且客观来说，无论是对于高校还是就业率来说，一旦适用样本扩大到一定程度，“严出”都有可能演变成一个费力不讨好的麻烦，需要更加智慧的方法切入。

更重要的是，目前针对“严出”的手段和政策中，只是把学生作为被动管理的对象，没有考虑如何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并没有解决“60分万岁”这个痼疾，而这恰恰是中国大学生之所以放松甚至放纵的根源。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提升本科教育质量的后果可能会大打折扣。

那么，毕业时根据学生学业成绩进行学位证书的分级，也许能够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体验过英国高等教育的人，应该对此深有体会。中国大学的学位只是笼统的学士、硕士、博士，毕业生只要符合毕业以及授予学位的标准，学位证书都是一样的，看不出区别，但英国大学的学位证书分三六九等，会根据你大学的综合成绩体现你的学位等级。

以英国本科为例，学位成绩是根据加权平均算法来计算的，并直接体现在学位证书上。各学科各学科有不同，本科通常以第2年和第3年各学科的分数的乘积以不同占比来计算（本科第1年的分数占比通常为0%，不计入最后的学位成绩）。本科的及格线是40分（低于40分没有学位），学位分以下四个等级：

40~49：本科三等（Third Class）
50~59：本科二等二级（2:2或Lower Second Class division）
60~69：本科二等一级（2:1或Upper Second Class division）
70+：最高本科学位等级（1st或First Class）

英国学位证书的作用重点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英国大学招收研究生的时候，不仅要看你的本科学校，还要看你的学位等级，如果你想申请G5院校的研究生，一般是要本科一等学位。申请其他排名较好的大学，一般也要至少2:1学位。

第二，英国的公司也非常重视学位等级。一般来说至少2:1学位，少数好公司的职位是要一等学位的。这也就意味着，当你出示学位证的那一刻，别人就能知道你在学校期间的学习好坏，不是像我们国内，考90分与考60分最后拿到学位证是一样的。由于深造和就业都要仰仗于更好的学位认可，其实就是平时成绩的积累，这等于通过优胜劣汰的分层，反过来刺激和倒逼学生对于平时学习过程的重视。

学位分等级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中国高校存在的核心意义在于培养人才，培养人才的目的则是在合适的岗位上各司其职，那么区分人才就成了非常重要的一环。通过学位证书的分级也可以让国家和用人单位更便捷地进行人才的识别。

当然，我们不能完全照搬英国的学位制度，而应该结合我们的国情和高等教育实际情况，但是这种“用疏不用堵”的巧妙倒逼模式值得我们借鉴。

（作者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教授）

区分学位等级或是提升高等教育质量「良方」

李志民

国际化人才培养是一流大学建设有效途径

■本报记者 王之康

在中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留学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据统计，2018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为66.21万，达到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当年也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9.22万名各类外国留学生在我国31个省（区、市）的1004所高校学习。

无论是走出去还是引进来，这些人的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国际化。

正如不久前，在大连理工大学70周年校庆期间举办的世界大学校长论坛上，与会者一致认为的那样，国际化人才培养，正成为中外高校的共同选择，也是一流大学建设的一条有效途径。

中外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事实上，从大学诞生之日起，学者的跨国交流和学生的跨国学习就是最具魅力的篇章之一。

“国际化水平，特别是培养国际化一流人才，已经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中国工程院院士、大连理工大学校长郭东明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既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受益者，也是重要的推动者。“40年间，中国向世界派出和接收了很多留学生，我们互相了解，包括建立经贸关系、开展学术合作交流，很大程度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1978年，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两国持久和平友好合作的大方向，为双方开展互利合作、谋求共同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在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中，中欧合作近年来也取得快速发展。

郭东明认为，在此过程中，中日、中欧在高等教育领域培育的友好人士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中外关系健康发展的根基，在于中外大学共同培养出大批知己知彼的中外友好人士，尤其是大批可助推中外友好的各界精英人才。“中外一流大学是培养中外友好精英人才的摇篮，增加本硕博的互派留学，让双方留学生深度体验彼此文化，是中外大学共同的社会责任。”

对此，东南大学常务副校长王保平也发表了类似观点：“我们培养的国际化人才，不仅要有家国情怀，还要有全球视野，不仅要走出去，还要把别人请进来，这不仅对中国发展很重要，对全世界发展也很重要。”

“当前国外高等教育的发展也为国际化人才培养提供了一定的机遇。”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校长陈杰说，欧洲共同体1987年成立“伊拉斯谟计划”，鼓励欧洲学生走向世界，到其他国家从事研究和深造活动；欧盟1999年提出的“博洛尼亚进程”，更是在整合欧洲高等教育资源、实现高等教育一体化、推动欧盟高校间的开放与合作中起了重要作用；欧盟2014年又启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交流合作项目——“伊拉斯谟+计划”；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极力倡导教育的国际交流，积极开展跨国、跨地区的教育合作项目，鼓励学生融入开放式的教育环境中，以培养国际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

可以说，在世界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一流大学之间，学分互认或学位生的学习交流非常普遍。

开展通识教育或是必然选择

不过，一个现实问题却摆在我们面前：在



中外一流大学是培养中外友好精英人才的摇篮，增加本硕博的互派留学，让双方留学生深度体验彼此文化，是中外大学共同的社会责任。

我们培养的国际化人才，不仅要有家国情怀，还要有全球视野，不仅要走出去，还要把别人请进来，这不仅对中国发展很重要，对全世界发展也很重要。

自然科学和工程领域，发达国家的一流学生中，鲜有到中国大学进行学分或学位学习者，在来华留学生中，又以学习语言和历史文化的留学生居多。

“这些都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不相匹配。”郭东明指出，中外大学需要发展与“一流大学”相匹配的路线图，吸引双方优秀的理工科学生平衡互派到对方进行长短期的学位学习或短期的学分学习，这是世界一流大学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王保平认为，学分互认涉及整个培养体系的问题。“中国的人才培养与美国、英国的人才培养显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的本科是四年，英国是三年，怎么对应？再比如电子工程专业，中国的培养方案跟美国的培养方案也不一样，怎么对应？”

“所以，中外高校首先要商量好，你的学生到我这儿来上哪门课你能认，我的学生到你那儿上哪门课我能认；其次，要尽量将培养方案趋同。”王保平说。

对此，郭东明也表达同样的看法。

“要提供中外一流大学学生在中外两国双校园学习的条件，即打通中外一流大学培养方案，双方协商好有关教材和教学大纲、学分互认、考试内容和时间、课程安排等事宜。”他说，同时要通过聘请高质量师资队伍和使用高质量教学评估体系，以高质量的教学水平为精英人才培养保驾护航。

而相对于某两所或某几所高校之间打通培养方案，实现学分互认，在王保平看来，开展通识教育是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一种解决方式。

“其实，美国大学一直倡导的就是文理学院，前两年开设的是通识课程，全美高校都一样。但在中国，目前主要还是分科教育。”他说，对中国的大学来说，前两年的通识教育应该基本上大家都一样，这是我们解决与国外高校学分互认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式。“当然，我们也要有中国特色，比如到大三、大四更多地与企业合作等。”

师资队伍建设是关键

对于如何与其他国家共同培养国际化人才，来自我国台湾地区的中国文化大学校长王淑晋道出了自己的苦恼：“在交流过程中，我们发现面临的重大问题就是语言受限。比如，最近有一个乌克兰的高校想跟我们交流，但我们没有学生会讲乌克兰话。”

对此，王保平也深有感触。“我们面向全世界那么多国家，各种各样的文化背景，各种各样的语言，如何国际化？假如每个国家都要建立跟它对等的语言来交流，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所有老师都既懂汉语，又懂日语、韩语、英语、希腊语等多种语言。”他说，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国际通用的英语来进行交流，培养就成了必然选择。

“但这里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有多少老师能够用全英文授课呢？对此，我们是准备不足的。”王保平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大部分师资应该说基本是自己培养的，有一部分是从海外回来的，但毕竟是少数。

以东南大学为例，该校约有2800多位老师，在王保平看来，拿到海外高校博士学位且有能力用全英文授课的老师也就200多人，“能够说英语的多一些，大概有1000多人，但能说英文并不等于能用英文授课，因为英文授课是有质量要求的”。

据与会专家介绍，按照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国际留学生比例大概为10%~15%，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建立本科生的全英文授课，因为只依靠硕士生、博士生的全英文授课是不行的。如果以“双一流”建设确定的交流、学分互认、联合培养为目标，高校朝着这个目标前进，预计再有5~10年，这个体系就能够完全建立起来，情况也会大为改观。

在王保平看来，从目前来看，要实现国际化人才培养的目标，首先就要补充师资，尤其是补充能够用英文高质量授课的师资。“除了大力引进海外人才外，还要建立更多的国外合作伙伴，请他们学校的老师来上课。比如，东南大学与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的联合培养项目，一半课程由东南大学教授，一半课程由蒙纳士大学教授，这样就解决了我们的师资问题。而且，授课是高质量的，学生是欢迎的，也更容易操作。”

“总而言之，师资是推进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关键。”王保平强调。